

基础教育教材建设实践对我国教育学 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贡献

张善鑫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同时也强调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实际上，回望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教材建设与管理实践，的确走出了“中国道路”，构建了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积累了“中国经验”，形成了独特的话语体系。我国的教材建设实践为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奠定了重要基础。以教材为载体，实现学校教育本土知识的传承，成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基础；以教材建设为路径，确保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断完善；以教材管理为手段，确保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方向和质量等实践，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教材建设实践；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

中图分类号：G4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86(2026)03-0031-07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这是对我国长期以来教材建设与管理传统的时代继承与创新。我国基础教育教材建设与管理特色实践为我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奠定了重要基础。系统梳理我国基础教育教材建设和管理的历史历程和实践经验，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特别是推动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具有深远意义。

一、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与教材体系创新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语境下，以教材为载体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凸显了独特的时代价值。

（一）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是重视本土知识、体现中国特色的现实要求

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发展道路、社会制度、发展条件等是构建其知识体系的真正起点。^[1]从这个意义上讲，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关注并紧密联系中国实际。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政策和学术话语中，“中国特色”被高频提及，中国特色实际上就是关注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当然也需要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当前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原因。一方面是以往较多借鉴国外理论，形成了理论误用、泛用及“水土不服”等问题，使科学研究中的原创性和自主性缺失，急需调整研究取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最终要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讲好中国故

基金项目：202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中国化教育话语体系构建研究”（24JD710016）。

作者简介：张善鑫，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兰州 730070）。

事。另一方面是研究中关注国情、体现特色不足,在客观上影响了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理应基于我国国情,这是强调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逻辑原点。进一步讲,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就是要呈现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认知经验系统,立足中国实际,研究中国问题,繁荣中国学术,传播中国思想和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精华,借鉴人类历史上的优秀文明成果,实现综合创新。^{[2]91}

(二)教材自主创新是构建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需要

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根本上是重视教育实践自主创新的体现。自主创新首先在于构建自主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进而衍生表达的话语体系,用以支撑自主知识体系。有研究认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必须以回答中国问题为逻辑起点、以运用中国素材为内容支撑、以表达中国立场为方向指引。^{[2]96}

实际上,教材是中国素材的重要载体,教材自主创新也是构建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需要。在教材中选取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特点的科学知识及理论方法,不仅有助于知识传承,而且有助于知识体系的构建。教材日益成为学校教育传承中华文化、传播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大背景下,自主知识体系要能够充分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能够反映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具有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禀赋,既凸显鲜明的民族特色,又体现普遍的人文关怀,让中华文明同其他国家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起,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1]当前,教材体系是知识体系的基本依托,无论实践中如何强调知识体系,都需要教材体系的支撑。

(三)教材体系是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基础支撑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包括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大体系”),这些体系将为教材建设提供理论基础和内容框架。“三大体系”的构建与相关研究,可以为教材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内容,使教材成为本土知识传承的基本载体。同时,教学体系是知识体系发展和创新的基

础,课程体系是知识体系构建和传播的手段,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课程体系,能够促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持续发展。教材体系是知识体系传承与发展的载体。^[3]

当前,我国通过教材建设和管理,不断探索、积累经验,已初步形成了涵盖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的教材体系。教材不仅为学校教育提供了基础支撑,而且通过传播本土知识,实现文化传承与立德树人根本目标,有效增强了学生对中华文化与国家的认同。通过教材,可以将自主知识、理念与方法传授给学生,促进学生知识框架的生成。在实践中,教材体系的革新也在客观上推动了知识体系的持续完善,两者形成有效互动。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与教材建设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传播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随着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逐步完善的教材体系已在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家国情怀的人才方面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基础教育教材建设与管理实践就是很好的佐证。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基础教育教材建设与管理实践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结合实践需要,开展了独具特色的教材建设与管理实践。从整个历程来看,体现了教材政策变革的基本趋向,从“国定”到“教材共有”;在教材决策上,从“国定制”到“审定制”,再到当前的统编统审统用,即“国定制”和“审定制”的有机结合,这是我国教材建设的经验。纵观我国古代各个朝代,统一政府都控制着教材管理。无论是国家指定制还是国家认定制,其内核是一致的,就是要确立一套标准的核心教材体系。^[4]中国特色的教材建设和管理实践为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教材及其政策实践是审视我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镜面”。

(一)基础教育教材建设与管理政策探索阶段(1949—2001年)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统一化”的基础教材建设实践是计划经济体制在教育领域中的集中体

现。^[5]1950年12月,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它一直是基础教育教材编写、出版、发行的专业出版社,逐渐成为基础教育教材出版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机构。结合国情、不断更新的教材建设指导思想一直是后来基础教育教材建设的主要依据,也是中国特色教材体系构建的基础。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明确了基础教育管理权属于地方。这一规定成为一段时间以来基础教育包括教材建设在内“权力”下放的政策依据。

1988年,国家教委制定了《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编写规划方案》,提出必须在统一基本要求与统一审定的前提下,逐步实现教材的多样化,以适应各类地区、各类学校的需要。1999年,基础教育三级课程管理体制正式提出,这为基础教育教材改革提供了政策支持。2001年,教育部印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成为21世纪我国基础教育教材改革的依据。同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印发,文件指出,教材编写核准、教材审查实行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两级管理,实行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这不仅明确了教材的编写要求,而且明确了不同层级主体的管理权限。也使后续中小学教材编写与审查制度经历了非常复杂的发展历程,即从“一纲一本”到“一纲多本”,乃至“多纲多本”,或者说由一种高度集权、编审统一的“国定制”到“编审分离、竞编选用”的审定制。^[6]

(二) 基础教育教材建设与管理政策持续调整阶段(2002—2016年)

随着基础教育教材建设与管理深入变革,人才培养的目标也发生了变化。从最早的“双基”到“三维目标”,再到后来的“核心素养”,逐步将基础教育教材改革的目标引向深入。围绕“三维目标”的要求,教材建设和管理发生了系统性变革,为提升育人质量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为兼顾各方利益和诉求,教材建设最为明显的变化是建立起了教育行政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出版部门和专家、学者、教师、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课程开发的有效机制。^[7]《纲要》指出,完善基础教育课程管理制

度,实现课程的高质量与多样化;实行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的课程多样化政策,鼓励有关机构、出版部门等依据国家课程标准组织编写中小学教材。客观而言,这些要求和变化不仅充分调动了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且使教材真正适应了不同地区、学校和学生的发展需要。

自2016年《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发布以来,核心素养成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指南针”和“风向标”。当前,核心素养日益被认为是世界教育改革的潮流、国际上学力排名的指标、现代正统教育的思考方法。^[8]核心素养是传统“知识与能力”目标的高阶表达,是对学校教育育人目标的进一步拔高和凝练,发展学生核心素养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基础教育教材政策演进的基本诉求,学科核心素养逐步走进教材实践。学科核心素养既是一门学科对人的核心素养发展的独特贡献和作用,又是一门学科独特教育价值在学生身上的体现和落实,是学科本质观和学科教育价值观的反映。^[9]全力推动学科核心素养落地,是对新时代基础教育教材建设和管理的目标定位。

(三) 基础教育教材建设与管理国家事权特征凸显阶段(2017年以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构建了覆盖学校教育各学段、各层次、各类型的教材与教材管理体系,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的教材实践。值得一提的是,建立并健全了教材管理体制,实现了教材管理的规范化。2017年国家教材委员会成立以来,教材建设和管理的国家事权属性持续彰显,成为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机制保障。一方面,国家教材委员会先后出台了各级各类教材建设和管理的制度与办法,建章立制,教材实践领域实现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另一方面,持续做好教材的编写、审查与使用的全流程管理,通过教材彰显国家的教育意志和基本的价值主张。“尺寸教材,悠悠国事”成为教育管理人员、教材研究专家、学者、学校师生的教材价值共识,成为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的底层逻辑与社会动力。尤其是随着基础教育阶段全覆盖推行使用统编教材,教育行政部门不断跟进具体问题,采取多种方式帮助不同学段、地

区、学校师生适应统编教材，进而提升学校的育人质量，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作为课程建设的核心，教材从“一纲一本”到“一纲多本”，再到“三科统编”的变化过程体现了国家政策对课程实践的指导及对学科发展的引领。^[10]党的二十大报告为教材建设擘画了蓝图，指出要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勾画了“教材一育人一强国”的逻辑链条，凸显了教材作为育人原点、战略基点、强国支点的精准定位。^[11]概言之，教材建设和管理的实践越来越成为我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基础工程和战略工程，意义非凡。

三、我国基础教育教材建设实践对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贡献

中小学教材是“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的重要载体。在一定程度上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教材自身变革、常态化的教材建设与管理等都是中国特色的原创实践，成为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关键。

(一) 以教材为载体实现自主知识的学校传承，成为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基础

教材为学生提供了基本知识的学习素材，是知识呈现的主要载体，也是本土知识传承的有效工具。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基础教育教材实践在为确保知识传承、人才培养提质升级、支撑世界最大规模教育和教育强国建设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形成了伟大的“中国实践”，不断丰富着中国教育学的内涵。从历史和实践来看，教材编写要按照科学的逻辑体系和知识要素进行有效组织，这既是对本土知识的选择，又是教学内容规范化、体系化的体现，形成了我国教材编写的经验。

教材审定的实质是对知识的选择，也是对教材呈现知识与逻辑体系的系统检视。要构建完整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就必须选择符合我国国情、满足教育发展需要与学生发展需求的知识内容，逐步构建有利于学生学习、教师教学和促进科学发展的知识体系，这对不断完善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至关重要。本研究认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前提是传承，构建的结果是发展，构建的目标是凝练特色。知识从根本上说是

精神产品，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所形成的观念、逻辑、方法的集中体现，反映了人们对于自身及客观世界的规律性认识。知识体系则是以高度理论化与系统化的学科、学术、话语等形态呈现的精神产品集群。^[1]构建本土的、自主的知识体系就是中国特色的体现，否则就不能称其为自主知识体系。

教材在构建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尤其在“三大体系”构建的学术背景下，意义重大。首先，教材建设与管理实践表明，教材对于教育学的学科体系构建具有独特价值，是教育学等学科构成与研究的重要内容。学校教育承载着传授知识和人才培养的双重职能，学校教育的主要途径是教学，教和学的中介是教材。教材不仅要反映国家的发展需求和文化特色，还要适应时代的变化。特别是在当前智能时代的大背景下，教材通过整合数据科学、智能教育等新兴学科的知识与方法，能够对教育学及相关交叉学科的变革提供最基本的实践支撑，促进学科内容与数字技术的交叉融合，推动学科体系的创新和发展。这一切都以教材为基本“抓手”。

其次，各级各类教材是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教材不仅在学校助力传递已有的知识，而且是学校“教与学”等学术研究的重点议题，是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的重点，也是教育学理论创生的基点，这无疑增强了教材学术研究的自主性，也在型构着教材的学术体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知识体系本身是对社会的主观构建，是对社会认识的深化，也是人类改造社会进程中的基本共识。知识体系是得到认可的知识谱系，具有普适性。因此，构建本身也是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拓展，需要借助研究完成。知识体系的构建和学术体系的创生也是动态互促的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教材的改革最终将促进学术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最后，不同时期的教材在发展话语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教材可以有效地传承基于不同时代中国发展与治理实践的叙事逻辑和方式，这不仅有助于学校教育中的知识普及，还能在一定范围内展示发展成就和文化自信，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毋庸置疑，教材在构建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具有基础性、战略性作用。教材不仅能

更好地服务国家的教育目标和文化传承，还能通过人才培养实践不断构建话语体系，表征着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特色。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能体现和反映本土实际的、中国特色的、有别于其他理论与实践的原创理论与话语实践；另一方面是话语体系本身也在深刻反映着未来学校教育改革与变化的趋势，能预测未来教育改革和发展方向。

本研究认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是“自主”，根本是“中国特色”，实践取向是“中国式现代化”。和世界上其他民族、国家一样，中国独特的历史传统、文化思维与现实国情，中国教育要面对的本土教育问题等，必然孕育并体现为某种具有中国特色或自主性的话语体系、问题意识与研究范式。^[12]关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就是要发展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表达中国话语和实践。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摆脱长期以来西方知识体系在某些方面的“桎梏”，理性审视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特色实践，彻底通过学校教材跳出以往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言必称西方”“动辄用国外”的尴尬窘境，用自己的话语体系理性表达我们的学术研究。当下强调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不是对西方理论和知识的全盘否定，而是更强调关注自身教育实践，尤其是在学校教育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概念、原理与理论体系。这应是我们一贯的方法论。

（二）以教材建设为抓手，促进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不断完善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坚守中国立场、彰显中国智慧、弘扬中国价值的知识体系，是具有文化主体性的独立自主的知识体系。^[1]事实上，不同时期的教材建设理念与方略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代表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人民的理论深度和精神高度，理所当然地应在各学科教材中体现，使之学科化、学理化，成为各学科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思想资源。^[13]教材建设要不断关注当下的最新实践，反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切实保障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和发展。

知识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主观反映，是对客观事物的理性认知和表达，具有一定的客观性。知识体系不仅涵盖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各

学科知识，还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德感召力、文化心理等要素。^[14]从我国的教材结构体系和长远建设角度来看，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开放的，需要通过教材建设滋养、丰富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容和架构，进一步指导我国的教材建设。显然，教材的知识选择是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基础，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必须依赖学校教材的知识传承。常态化的教材建设的确为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创造了条件，教材建设进程是不断选择、整合知识，构建知识体系的过程。按此逻辑和要求，教材的建设工作是按照教材既有的知识框架和体系使其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这一点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教材建设实践中已充分体现。各级政府不断完善教材建设的环节，切实以教材建设推动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旨在保障知识选择的合理性、既有知识体系的完整性、知识传承的有效性及知识体系构建的常态化。教材建设的实质是选取学生必须学习并构建起来的系统知识，使之系统化、体系化的过程，是教育学中课程理论关注的内容，也是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过程。

从两者关系的角度而言，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系统化地推动教材建设，坚定不移地体现国家意志，特别是以基于中国发展与治理的广泛实践和典型案例为素材来源，切实建设自主素材支撑的自主教材。^[15]进一步讲，不仅要有素材，而且要通过教材建设将特色实践理论化，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理论基础，以推动和实现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在教材中融入自主知识原则、理论、逻辑、方法等内容，是根本意义上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同时，教材也是知识体系的重要载体，教材建设就是要通过各级各类教材的编写、审定和使用，通过知识的传承促进知识体系的重构。从这个过程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教材建设和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在实践中相互促进，教材建设反馈的需求无疑在推动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不断完善。教材中对理论构建、知识选择与运用的深入探讨，会引发学术界对这些领域的深入研究。这实质上就是在关注教材建设实践的基础上，通过教材的学术研究不断丰富自主知识体系。

教材建设是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分,对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需要强调的是,教材建设体现了党和国家意志,具有鲜明的国家事权特征,也担负着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重要使命。当前,通过教材建设的顶层设计实实在在构建与发展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也在更大范围内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理念和文化的认识与理解,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因此,教材建设应高度关注和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实践、成功经验和理论成果,通过打造能够适应新时代新要求、体现中国特色的高水平原创性教材,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用中国话语阐述中国发展,生动讲好中国故事,促进学生扎根中国现实来认识与回答中国问题。毫无疑问,教材建设的创新与变革有助于推动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不断完善。

(三)以教材管理为手段,确保中国特色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方向和质量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中国社会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学术使命,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当然,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包含于人类知识体系之中,并非“孤芳自赏”的自说自话。^[15]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理应在理论构建和实践自信的基础上,走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教材建设和管理也不例外。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不断加强教材建设,持续进行教材建设的高位谋划,加强对各级各类教材的管理,为教育学等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持续作出应有的贡献。客观而言,国家教材委员会加强教材管理的顶层设计,进一步丰富了教材建设的相关理论,积累了教材管理的经验,不仅保障了中国特色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不断构建,而且保障了中国特色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方向和质量。从教材建设的流程来看,教材管理是教材建设的进一步完善,也是构建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机制保障,体现了其多维的贡献。

首先,教材管理制度为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制度支撑。教材管理通过制定和执行一系列政策、标准和规范,保证教材建设各个环节的正确导向和价值取向。当前,国家教材委员会出台了各种管理制度,为教材管理提供了基本

遵循,为后续的教材管理实践提供了重要指导,明确了教材管理的方向与重点任务,为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制度保障。

其次,教材管理对教材编写、审查、使用、评价等实践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教材管理不仅关注教材的编写,而且注重教材的使用与评价。教材编写阶段确保将自主知识的相关内容融入教材,可以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同时,教材管理也鼓励和支持教师在教学中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以更好地传播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容,在实践中形成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完整链条。

最后,教材管理和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相互促进。一方面,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可以为教材管理提供新的理念和方法;另一方面,教材管理革新将推动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不断创新。加强教材管理,可以更好地服务国家的长远发展和人才培养战略。教材管理过程体现了国家意志,体现了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当前,教材管理应与时俱进,要通过教材讲好中国故事,这些措施都在助力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审视基础教育教材建设与管理与实践对我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贡献,也是审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经验,彰显制度自信,这也是一如既往地开拓继承、创新发展和持续改进的过程。通过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进而逐步推动自主学术体系的构建,这应根植于中国式现代化及历史进程的基础上。本研究认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过程,不仅要生动地展现波澜壮阔的“中国之治”,而且要深刻阐明生动发展的“中国之理”,更要坚定不移地走好“中国之路”。厘清基础教育的教材政策实践就是要全面勾画基础教育教材建设与管理实践的“中国方案”,系统总结教材建设与管理实践的“中国经验”,以教材建设和管理的特色实践为基础,深刻揭示基础教育教材建设与管理发展过程中的有益经验,不断探索、积极构建与完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这将是未来亟待深入研究的领域。

参考文献:

[1] 杨海英.以高度的学术自觉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 [N]. 光明日报, 2023-11-28 (6).
- [2] 张东刚.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若干思考 [J]. 中国社会科学, 2024 (5): 90-104.
- [3] 刘伟. 积极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N]. 人民日报, 2022-07-19 (11).
- [4] 周全, 孙锦涛. 我国古代教材管理的模式、特征及经验研究 [J]. 教育史研究, 2024 (3): 145.
- [5] 张善鑫. 教材意识形态: 内涵、演进与安全策略: 兼论新中国成立以来基础教育教材建设的意识形态安全 [J]. 课程·教材·教法, 2023 (6): 25.
- [6] 杜尚荣, 李森. 我国中小学教材多样化建设 30 年: 历程、问题及对策 [J]. 课程·教材·教法, 2016 (6): 33.
- [7] 黄忠敬. 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政策: 历史、特点与趋势 [J]. 课程·教材·教法, 2003 (1): 24.
- [8] 肖驰, 赵玉翠, 柯政. 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政策: 第十三届上海国际课程论坛综述 [J]. 全球教育展望, 2016 (1): 115.
- [9] 余文森. 从三维目标走向核心素养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16 (1): 12.
- [10] 李敏, 殷世东. 中国课程论自主知识体系的演进及建构 [J]. 中国教育科学, 2025 (5): 140.
- [11] 余宏亮. 中国教材学论纲: 议题与框架 [J]. 教育研究, 2024 (12): 87.
- [12] 檀传宝, 哈雪卿. 理论自主性建立何以可能?: 对“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概念反思 [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25 (6): 42.
- [13] 郑富芝. 尺寸教材 悠悠国事: 全面落实教材建设国家事权 [N]. 光明日报, 2020-01-21 (13).
- [14] 赫曦滢.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三重逻辑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5-02-17 (1).
- [15] 郁建兴, 黄飏. 确立基于中国发展与治理的叙事逻辑和叙事方式是建构自主话语的关键工作: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有效路径 [N]. 北京日报, 2024-01-08 (11).

(责任编辑: 王 润)

Contribution of Textbook Construction Practice in Basic Education to Construction of China's Pedagogical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Zhang Shanxin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poses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ary, academic and discourse system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field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mphasizing textbook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practice of textbook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has developed a Chinese path, constructing the disciplinary and academic systems, accumulating the Chinese experience, and forming unique discourse system. These efforts have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d to establishing the pedagogical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n China. Using textbook as carrier to transmit indigenous knowledge in school education ha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edagogical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using textbook construction as path can improve the system, and using textbook management as approach can guarantee the direction and quality of the construction.

Key words: textbook construction practice; pedagogy;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